



## 杰出的教育家蒋南翔

○ 紫苑学会



5年清华学生，14年清华校长，他75年的人生历程中，与清华有着深刻的联系。从“一二·九”运动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振臂高呼，到20多年后“又红又专”方略的辉煌影响，他以革命家的坚定、政治家的敏锐以及教育家的纯粹，带领清华在时局中前进。

他的名字是蒋南翔。





1949年蒋南翔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上

### “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

江苏宜兴，是历代文人武将频出之地，有着“教授之乡”的美誉。据不完全统计，从古到今，从宜兴走出了4位状元、10位宰相、385名进士、23位两院院士、60多位大学校长、8000余位教授和副教授。1913年10月6日，蒋南翔在宜兴高胜镇出生。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他正准备进入高胜镇溇南小学读书。“三一八”惨案发生的1926年，蒋南翔进入宜兴中学。

1932年，蒋南翔考入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

1933年秋，20岁的蒋南翔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他主编过《清华周刊》、《北方青年》，并担任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支部书记。

1936年3月，还在读大学的蒋南翔赴上海，任上海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同年秋，蒋南翔回到北京，任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蒋南翔任中共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曾协助刘少奇编党内刊物《斗争》。

1938年初，蒋南翔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

全国学联党团书记。

1939年初，蒋南翔任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在大后方青年工作中，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政策，保存和发展了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

1941年蒋南翔到达延安，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青年委员会宣传部长。他以《解放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身份，写了不少关于青年工作的文章和调查报告。蒋南翔积极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对后期出现的抢救运动大胆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并向中央写出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南翔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担任多个领导职务，为东北根据地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骨干。在此期间曾先后出国到布拉格、华沙参加国际青年会议。

1949年，蒋南翔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1月到中央青委工作，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副主任，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





记，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建国初期共青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底，39岁的蒋南翔迈进了熟悉的清华园，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开始了他从事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光辉历程。在欢迎会上，蒋南翔深情地说：“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在1932年到1937年期间，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正是在这个强敌压境、我们祖国处在风雨飘摇的困难时期，我在这里开始了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再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1959年底后，在兼任清华校长期间，蒋南翔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常委委员会委员，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等教育部部长、党委书记。

1966年6月，蒋南翔被停职反省，1968年5月，蒋南翔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进行“监护”审查，后在学校汽车厂铸工车间劳动，继续接受审查。1974年他因为对当时清华的“教育革命”发表不同意见，再次受到迫害，先后在河南林县、辉县、洛阳等地体验生活，深入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和矿山机械厂考察和劳动。

1977年，蒋南翔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科委主任，倡议建立了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并积极建议尽快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

1977年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蒋南翔主持起草“高教六十条”等重要规章；重视发展研究生教育、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和理工农医学科教材建设。重任教育部长后，他努力恢复和发展遭到“文革”极度破坏的教育事业，提出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教育；要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在中央党校，根据中央对党校工作的指示、遵照中央领导的意见和建议，他协助王震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校工作。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清华自建校起，学生就有着关注国事心系天下的传统。蒋南翔在校期间参加了进步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又参加秘密的社联小组。1933年，蒋南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开始担任党支部书记。

1935年初，进步学生掌握了清华园里重要的宣传工具——《清华周刊》。蒋南翔是学中文的，政治思想觉悟高，又是地下党员，所以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其后的《清华周刊》刊载的爱国进步文章吸引着广大学生，为“一二·九”运动在清华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2月初，正当北平各校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纷纷发表反对日本策划的所谓“华北特殊化”的宣言，并准备请愿时，传来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爱国学生痛感华北的沦丧已迫在眉睫。直接领导北平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北平学联党团当机立断，决定在当天即12月9日举行大规模抗日救国请愿活动。

12月3日，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接受北平学联决议、参加全市统一请愿的议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工作的清华学生何凤元得悉消息，非常高兴，从城里赶回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

蒋南翔事后回忆，他“当天晚上就独自躲到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当时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我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己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宣。”文章被油印出来，在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还刊登在12月10号出版的《怒吼吧》第一期上，名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文中“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赶快大家联合起来，……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等语，澎湃激越，表达了青年学子们的共同心声。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1935年12月9日)

亲爱的全国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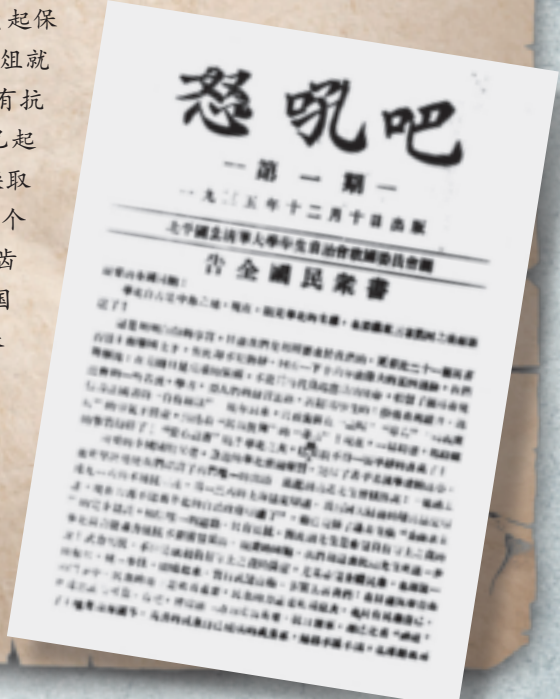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

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回看一下十六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份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亲爱的全国同胞父老，急切的华北丧钟声响，惊醒了若干名流学者的迷梦，也更坚决地使我们认清了我们的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适之先生曾慨然说：“他过去为‘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为‘一·二八’的上海协定辩护，为热河失陷后的塘沽协定辩护，现在却再不能为华北的自治政府辩护了”。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因此胡先生是希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华北长官能尽力抵抗不要屈服妥协。亲爱的同胞，我们却还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说：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尤其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统一步伐，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事实告诉我们：在目前反帝自卫的斗争中，民众的地位是更为重要，民众的力量是更为伟大，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实而可靠。看吧，曾煊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可化为“神龙”了；惟有山海关外，英勇的民众自己组成的义勇军，始终不屈不挠，在用鲜血写着中国民族的光荣斗争史。

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创痛的经验教训了我们，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我们决再不盲然地服下这剂毒药；为了民族，我们愿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我们已是被遗弃了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荣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中国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唇亡齿寒，亡国的惨痛，不久又要临头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清华大学救国会  
中华民国廿四年十二月







1958年周总理在蒋南翔陪同下参观展览，对“土油开关”用上乒乓球浮标很感兴趣



12月9日，北平高等学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学生涌上街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封锁、包围和阻挡，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但北平分会负责人何应钦早已闻风避往小汤山，只留秘书出来“抚慰”学生。爱国学生当即决定举行示威游行。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开始全市总罢课。1935年底，平津学联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各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由北平学生的“一二·九”游行开始的全国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曾精辟地分析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1936年2月29日清晨，国民党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清华园进行搜捕。蒋南翔到二院宿舍布置其他人隐蔽，他从二院一间宿舍的窗户跳出去，随即被捕。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被关在西门传达室，陆瑾等人将他们抢了回来。当天晚上，军警又来搜捕，蒋南翔躲在三院食堂里，换上工友老刘的衣服，脸上又是汗水又是煤灰。军警搜查三院，他装作若无其事，还给他们倒水喝，在军警的眼皮底下安全脱险了。

### “正确地学习苏联，稳步前进”

1952年，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全国范围内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理、法、航空等学院及工学院部分系和专业先后调出（1949年农学院已经调出），清华变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

在院系调整期间，清华图书馆相当数量的图书资料也被调拨出去。刚刚就任为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闻听此事，断然将馆藏的30万册珍贵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铜器等一批珍贵文物保留了下来。当时这些举措都为清华大学重新走上综合性大学的道路留下了一条后路。可以说，蒋南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清华的未来做了最好的打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存了老清华的文脉。

蒋南翔对原有的理学院等院系调出清华深表惋惜，表示“工学院怎么可以离开理学院”。为了建设新的清华大学，他带领一些清华干部到东北鞍山等工业城市考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认真调查，了解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要求。他强烈意识到，清华仅有工科是不够的，要搞新技术，建新专业。

1955年9月到10月，蒋南翔率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赴苏联就和平利用原子能和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等问题进行考察。考察归来，蒋南翔深感为国家培养原子能干部的任务重大。他在高教代





1959年蒋南翔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号召学生做“共产主义播种者”



1962年，蒋南翔和清华电机系毕业生在一起

代表团访苏报告中说：“培养原子能的干部需要设置一批新专业，这些专业有些是直接和原子能的利用有关的（如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等），有些是配合原子能的研究工作和实际运用所必需的（如无线电、物理方面的专业）。”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先后作出研制原子弹、氢弹的战略决策，1958年5月，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两弹一星”工程拉开序幕。从1955年开始，蒋南翔在清华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10个新技术专业；1956年设立工程物理系，随后几年又相继增设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和自动控制等系，并有意识地发展应用理科。到1965年，清华大学已发展为12个系40个专业。在蒋南翔的亲自指挥下，清华大学建造试验原子反应堆。他亲自筹措经费，争取特殊材料，敦请市委批准厂址，组织研究队伍并协调校内外的大协作。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依靠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的艰苦创业，终于在1964年建成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试验原子反应堆，为发展我国国防事业与和平利用原子能做出了贡献。

在蒋南翔的规划下，清华的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无线电、自动控制、计算机后来都壮大起来，成为清华的半壁江山，核科学与技术、固体力学、先进制造、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等学科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高新技术专业为学校的建设，为我国的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新兴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全国范围学习苏联的浪潮中，蒋南翔一直从实际出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显示了一位杰出教育家的眼光和智慧。1953年3月，蒋南翔在全校教师党、团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求学习苏联，不能满足在形式上，不能满足于简单地抄袭，要用思想，要开动脑筋”，“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偷懒”。8月，蒋南翔在第五次教学研究会作报告，强调要“正确地学习苏联，稳步前进”，他指出“在学习苏联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和本国及本校的实际情况结合，防止冒进，也防止保守。”“所谓‘冒进’，就是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估计客观条件，去做不可能达到的事情。所谓‘保守’，就是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不努力去做，停滞不前，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条件，适应国家的需要。”1956年蒋南翔再次强调“反对只是简单抄袭苏联现成作法而自己不假思索和具体分析的那种学习态度，主张研究我们国家和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努力把苏联经验





1961年蒋南翔给毕业生作报告，号召“又红又专”

同我们的实际情况适当地结合起来。”

学习苏联的同时，蒋南翔还强调要博采众长，注意学习英美。他指出“我们学习苏联，绝不是说就要完全拒绝学习英美有用的东西，相反，我们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吸收一切国家有用的东西。”1956年8月30日，蒋南翔等人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再次提出“向苏联先进经验学习，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例如英美高等学校所通行的自由选课制度，我们也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过去对于吸收和学习英美或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有用的东西，曾有重视不够的地方，应该克服这种缺点。”

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清华大学校园面积急需扩大，因西面受圆明园的限制，学校考虑向东发展建新校区，而当时校园东侧的京张铁路已成为学校向东发展的障碍。1954年校园总体规划强调应当一方面“和旧区很好联系”；一方面要“使新旧区成为整体”。同年，学校决定“铁路改道问题关系今后新区建筑轴线问题，应由学校即与铁道部联系，了解改道计划，以便肯定总体规划任务。”年底蒋南翔即向高教部函请铁路迁移，请高教部转请铁道部在北京市铁路线规划中考虑将铁路迁移。之后蒋南翔经过多次与高教部、铁道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艰难磋商，历时近三年，直至1957年10月，高教部终于同意将校区的铁路“向东迁移至距八大学院约200公尺地段”。

正是向路东发展及铁路搬家这一有远见的

战略性决策，为清华大学的校园扩大和长远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使得清华的校园得以始终在原来的校址上不断发展，连成一个整体，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此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 “又红又专”

1961年，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蒋南翔主持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被简称为“高教60条”的这份条例中专门有一条指出要“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红”当然是指政治立场上的“红”，“专”是指科研学术方面的“专”。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全国就已经开始了红专问题的大辩论。当时的校园里，“先红后专”、“先专后红”、“红专分工”等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在流传。蒋南翔总结说，高校应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院系调整后，清华的教师一部分是教授、副教授等老教师，是学校办学、治学依靠的基本力量和进行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力量。另一部分是教员、助教等青年教师，政治觉悟高但是业务水平显得不足。蒋南翔把清华解放初期的108位教授、副教授称之为百零八将，“是清华的稳定因素”。其次，蒋南翔强调要加强对清华师资队伍的培养，党员干部必须与党外专家结合，实现“两种人会师”。即一方面帮助非党员的教授、副教授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吸收其中一些思想进步、表现积极、符合党员标准的老教授、副教授入党；另一方面要帮助中青年党员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学术水平，培养他们成为新一代的专家教授，从而使新老教师一起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提高成长，实现“会师”。1955年，蒋南翔亲自介绍我国工程教育界的老前辈刘仙洲入党，他在发展刘仙洲入党的支部会上的讲话，以《共产党员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为题先后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在全国知识界、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梁思成、张子高、张维、张光斗等30多位知名教师陆续入党，成为“又红又专”的典范。新、老教师在又红又专方向上的“两种人会师”，这后来逐渐成为清华培养教师的重要模式和机制。

在人才培养上，从1958年开始，清华结合



生产任务，以承担和完成某项实际生产或科研任务作为学生毕业设计的课题。在学生在校学习最后阶段，把模拟的设计训练发展为“真刀真枪的实际作战”，使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收到良好效果。1958年全校1400余名毕业生有70%的毕业设计是结合生产任务进行的，其中228项被校外有关部门鉴定为优秀设计、141项有创造性成果。在1965年高校部举行的展览会上，清华展出了原子反应堆、密云水库设计、程序控制铣床、电子感应加速器、数字电子计算机、光速测距仪、浮动喷射塔板等70多项研究成果，数量居全国之冠。教师和学生的科研和学习，在蒋南翔教育方针的引领下，都充分展示了“专”的水平。

谈到“红”，蒋南翔要学生做到“两个拥护，一个服从”，即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服从分配。要培养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使他们成为一个肩膀挑政治工作担子，一个肩膀挑业务工作担子的“双肩挑”干部，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也要出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等党政干部。《蒋南翔传》中写道：第一批政治辅导员由25名大三学生组成，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党团干部的工作负担。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在位于新林院的蒋南翔家中召开，他对大家说：“一个人年轻时担任一些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一生的工作都会有好处。这就像唱京戏要从小训练、科班出身一样。”在蒋南翔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近14年当中，学校为国家培养了2万多又红又专的优秀毕业生，大部分成为各行各业的技术中坚和领导骨干，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在清华园中，每天下午4点半，校园广播都会响起这一段熟悉的声音。“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来自蒋南翔的浓缩了清华体育精神的话语，已经响彻清华近半个世纪。

1953年初，在蒋南翔担任校长不久，他就几次对学校体育教研组的老师和学生会干部谈起解放前清华优良的体育传统，如钱伟长教务长曾是长跑运动员，梁思成先生是标枪运动员，符保卢先生还代表旧中国参加过奥运会等等，他提出



1964年蒋南翔（左）、刘仙洲（中）祝贺马约翰从事体育教学五十年

“……要大力开展学生体育活动。既要开展大众的传统体育活动，也要开展各种体育项目活动，同学们要经常锻炼，要定期举办学生的体育竞赛……”1953年5月，第一届校运动会开幕，共有千余名学生运动员参加。钱伟长教务长等几位老教授也分别参加了田径项目的比赛。开幕式上，蒋南翔校长再一次强调“要求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学校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今后要定期举办体育竞赛活动。”

蒋南翔最早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一口号是在1957年11月29日，那天在清华大学礼堂前的阶梯教室举行全校体育工作干部会议，体育教师、运动员、团委、学生会干部及体育积极分子300多人参加。当时，他说：“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因为年纪越大，知识、经验也就越丰富。老年应当是收获的季节，但有些人却未老先衰。因此要想在年老丰收，就必须在青年时代播种。”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中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执教清华52年。1964年1月，在马约翰先生为清华工作五十年的庆祝会上，蒋南翔提到：“把身体锻炼好，以便向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赛，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从此，“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口号，成为清华人脍炙人口的奋斗目标。

清华体育教研部退休教师田端智回忆说，那个时候，每天下午4点半，同学们都走出课堂、图书馆、宿舍，到操场上去。各班级组织起锻炼队伍，集合整队，由小队长带领高呼：“为祖国！锻炼、锻炼、锻炼！”马路上、操场上、球





1985年蒋南翔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上讲话

场上到处都是锻炼的人群，犹如万马奔腾，热火朝天，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欢乐。

1954年2月，蒋南翔提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学校体育工作方针，之后不久，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宣告成立，体育代表队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培养运动员，坚持业余锻炼，同时蒋南翔校长还建议成立运动代表队工作组，建立党团组织，办运动员食堂、宿舍，培养了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运动员，开创了大学体育教育的新思路。学校在1954年成立了8个体育代表队，到1959年已增加到38个。在蒋南翔任职期间，学校共培养出国家级运动健将11人、一级运动员20余人。在1959年至1966年举办的六届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上，清华大学连续6次夺得男子团体第一名、5次女子团体第一名的骄人成绩。

### “一生唯实求是”

1961年，蒋南翔在总结清华的经验时，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两点论”的观点。所谓“三阶段”，指清华已经走过三个时期，“即解放前后的旧清华时期，1952年以后的教学改革时期和1958年以来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期”；所谓“两点论”，指“每个时期都有值得保留的东西”，三个时期都应一分为二。“老清华早有门槛高（即招生要求严）、底子厚（即基础理论学得好）、后劲大这些好的传统，要继承”；教学

改革时“向苏联先进经验学习”，“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1958年后探索按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把学校建成“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者结合的先进基地”，“1958年以后的经验最为宝贵”。

陈云在蒋南翔逝世后的题词中写道：“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这是对蒋南翔优秀思想品质的高度概括。实事求是，“唯实求是”是蒋南翔一贯的风格。而“三阶段、两点论”就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

蒋南翔在清华任职14年间，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办学指导方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注重“各按步伐，共同前进”、“两种人会师”、“团结百分之百”；他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同要求的三个台阶；他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统一，提出“干粮与猎枪”的著名论述，倡导“真刀真枪”毕业设计，创立“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努力建设“三支代表队”即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政治辅导员队伍；他倡导“基层出政策”，重视“两个车轮”，以唯物辩证法指导学校工作。蒋南翔这些从实际出发、充满辩证法的思想，正是其“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真实写照。

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蒋南翔受到长期的残酷迫害，多次被“红卫兵”拉到会上批斗。但他面对百般凌辱和诬陷，毫不畏惧，自始至终不屈服，不动摇，公开阐明自己的正确观点。他说，“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认为“只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可轻易放弃”。

尽管十年“文革”结束以后，蒋南翔校长没有再次回到清华工作，但他重返教育战线，担任领导工作，从更高层面帮助清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蒋南翔担任教育部长，推进教育改革，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1982年8月，蒋南翔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他协助王震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校工作。同时，他参加创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并当选为第一任会长。随着时间推移，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在清华得到继承和发扬，已经熔铸进广大清华师生的灵魂，引领着清华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